

“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存在

■ 朱天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由于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最近的一次发言,“中等收入陷阱”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据报道,楼继伟认为“中国未来几年有 50%的概率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此言一出,激起千层浪。笔者认为,楼继伟是有名的学者型官员,有学者般率真,但身为官员,未必要如学者那样严谨(诚然,多数学者在讨论众多现实问题时,也并非十分严谨)。“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由世界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很不严谨的概念。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 2007 年世界银行出版的一份报告里,两位作者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处在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夹缝中,它们在劳动力成本上失去了优势,不能靠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同时又缺乏足够的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竞争。根据他们的说法,很多拉美、北非和中东国家的经济长期停滞在中等收入水平,而“东亚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则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真的存在吗?

虽然“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在中国很时髦,但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在严谨的、经过匿名评审的学术文献中却几乎毫无影响力可言。原因很简单——“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并不存在!这个概念在中国的流行恰巧印证了一个成语:“危言耸听”。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标准,人均 GDP 在 1036—12615 美元之间的国家被称为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世界银行在划分高、中、低收入水平时用的是绝对收入标准(这个标准每年会根据几个主要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而不是一个相对收入标准。如果一直沿用此标准,只要一个国家人均 GDP 增长大于零,早晚都会成为高收入国家。事实上,世界银行于 1988 年初次定义的全球高收入经济体有 41 个,而在 2013 年则猛增至 76 个,也就是说在短短 20 余年间,已经有 35 个原来的中等收入国家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根据这个标准,又何谈“中等收入陷阱”呢?

因此,只有用一个相对收入标准来划分

虽然“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在中国很时髦,但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在严谨的、经过匿名评审的学术文献中却几乎毫无影响力可言。原因很简单——“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并不存在!这个概念在中国的流行恰巧印证了一个成语:“危言耸听”。



高、中、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才可能有意义,但也绝非必然。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等收入国家是相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的,本来就应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下面我用美国作为高收入国家的标杆,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 GDP 占美国人均 GDP 的百分比来衡量其相对收入水平。根据学术界通用的宾大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 或 PWT)的数据,我将购买力平价调整后人均 GDP 不到美国 10% 的国家或地区划为低收入经济体,达到美国 40% 或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划为高收入经济体,介于 10—40% 之间的就叫中等收入经济体。以中国为例,1978 年的人均 GDP 只是美国的 2.4%,几乎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比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穷,2002 年达到美国的 10%,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根据上面的定义,在宾大世界表的数据中,1960 年时全球共有 42 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其中只有 12 个最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它们分别是亚洲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以及中东的以色列与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其中西班牙、希腊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三个国家在 1960 年的相对收入已经达到美国 35% 的水平。其他 30 个中等收入国家的相对收入水平要么原地踏步,要么还有倒退。这样看来,似乎“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尽为空穴来风。然而,这些国家相对收入增长的停滞,真的与它们处在中等收入水平有关吗?

难道真如“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所宣称的那样,收入发展“从低到中易、从中到高难”?事实并非如此!

纵观 1960 年时的低收入国家在过去 50 多年里的经济增长情况就会发现,当年的 42 个低收入经济体中,只有 8 个国家最终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分别是非洲的赤道几内亚和博茨瓦纳(前者发现了大量的石油,后者有丰富的钻石资源),亚洲的中国、泰国、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以及中东的埃及和突尼斯。其余绝大多数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既不如高收入国家,也不及中等收入国家,相对收入水平不增反降。

由此可知,一个发展中国家(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因为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就有所停滞。事实上平均说来,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还快过低收入国家。过去 50 多年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都非常缓慢,相对于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不仅没有明显增加,多数情况下还下降了,这与它们是否处于低收入还是中等收入阶段无关。“发展陷阱”或许存在,但与收入水平没有关系。而且中国恰恰是少数几个没有落在这个发展陷阱里的国家。

“中等收入陷阱”尤其不适用于中国

笔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尤

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存在巨大地区差异的大国。中国的人口超过欧洲、拉美和非洲各大洲的全部人口,中国内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也不比拉美各国之间的差异更小。

中国的 31 个省、市、自治区中,有些已经达到或者接近高收入经济体的水平,多数属于中上收入水平,还有少数属于中下收入水平。目前除了沿海地区一些省市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大多数省份的增长速度依然非常可观,没有明显下降的迹象。

京津沪已经达到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标准。除了这三个直辖市,中国还有 30 多个省会城市或地级市的人均 GDP 达到了高收入经济体的水平。中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属于世界银行定义的中上等收入经济体,沿海省份五年内都会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而其他省份的增长速度平均说来快过沿海地区的增长速度。在这些事实面前,“中等收入陷阱”一说不攻自破。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模糊了中等收入国家之间巨大的差异,容易误导人们将经济发展速度简单地与收入水平挂钩,不利于我们去理解和探究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中等收入只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阶段,而不是经济增长的陷阱。

什么造就了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东亚奇迹”?

适宜的激励机制,鼓励人们去创新,而个人的努力最终将带来社会财富的积累。诺斯的理论在中国一度风靡一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中国人很容易理解制度变迁带来的巨大差异。人们对计划体制时期的短缺和低效仍然记忆犹新,而对改革开放之后物质财富的涌流惊叹不已。但从诺斯的理论本身来看,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如果我们继续追问,为什么会出现有效率的产权制度?为什么国家拥有了暴力潜能之后不去掠夺臣民,而是要去保护私人产权?反过来,如果保护私人产权真的是带来长期收益最大化的唯一渠道,为什么国家那么短视,会杀鸡取卵?

另一位制度经济学的大师曼瑟·奥尔森独辟蹊径,他在《国家兴衰探源》中强调了利益集团的作用。国家不是铁板一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人们组成利益集团之后,他们更愿意去保护私人产权;也就是说,他们更关心如何分到更大的一块蛋糕,而非把蛋糕做大。更糟糕的是,利益集团在抢夺蛋糕的时候,会故意破坏社会财富,就像公牛闯进了瓷器店,横冲直撞,留下狼藉一片。如果社会长久地稳定,利益集团就会逐渐滋生,要想阻止利益集团的壮大,有时候不得不依靠革命和暴力。奥尔森谈到,二战之后西欧和日本发展速度迅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战争肃清了既得利益集团。

同理,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会比苏联更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副产品就是粉碎了既得利益集团,所以中国在推进改革的时候,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几乎没有遇到巨大的社会阻力,但苏联试图推进经济改革的时候,根本绕不开庞大的官僚机器和无处不在的既得利益集团,举步维艰,顾此失彼。奥尔森的观点可谓精辟,但细思极恐。杰斐逊说,“自由之树要靠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不断浇灌”,据说毛主席也说过,“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难道不破不立,就是历史的轮回?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斯将诺斯的观点继续向前推进。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斯认为,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之间总是保持着张力,未必完全一致。政治制度可以是包容性(inclusive)的,也可以是汲取性(extractive)的。同样,经济制度可能是包容性的,也可以是汲取性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汲取性的,也就是说,只有少数人能够掌权,那么,这个国家就很可能采取汲取性的经济制度,国家会不断地从臣民那里榨取财富,哪怕最后是极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陈全生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圆晨	范恒山	樊 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葛志荣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 康	江春泽	金 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京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 伟	茅于軾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 杰
吴 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晏家庆	杨启杰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无论是“从低到中”,还是“从中到高”,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收入阶段跨越都显得举步维艰。但有几个国家和地区却是例外,其中最为突出、跨得最快的就是中国以及同处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后者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速度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韩国和中国台湾更是经过 40 多年的奋斗,成功跨过两个发展阶段,从低收入的农业社会跃升为高收入的现代化经济体,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是什么创造了东亚的增长奇迹呢?在这个问题上有几派观点,其中一个可以称之为“发展型政府”派,强调政府干预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认为东亚的经济腾飞是强势政府推动符合本地情况的产业政策的结果。但是为何只有当年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现在的中国大陆政府干预成功?又为何干预程度较小的新加坡和作为自由市场典范的香港同样实现了经济腾飞?这一观点就无从解释了。

与“发展型政府”派相反,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东亚奇迹恰恰证明了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出口导向的市场化经济体制可以让任何国家脱贫致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有实现经济腾飞,要归咎于其错误的制度和政策,因为它们要么采取了以进口替代为导向的、国家过度干预的工业化策略,要么搞了国有化和计划经济。这些观点听上去不无道理,但无法解释为什么世界上 100 多个发展中国家只有几个东亚国家和地区采取了正确的市场经济政策。更令人不解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 1980 年代以后就放弃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政策,推行了私有化、市场化的经济改革,然而,无论是拉美还是非洲国家,过去二、三十年的增长速度反而比 1980 年代市场化改革之前更慢。自由派经济学家对此的解释是这些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还不够彻底,相关的一些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但是,中国在世界各国经济自由度以及制度质量的排名不逊色于大多数拉美国家,甚至比很多非洲国家还不如,不过也并没有妨碍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这些事实虽然无法证明自由派所推崇的市场化改革导致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增长减速,但起码说明市场化改革并没有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奇迹。

(下转 02 版)

制度演进解码

■ 何帆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斯是年轻一代经济学家中的翘楚。阿西莫格鲁现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罗宾斯是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阿西莫格鲁 1967 年出生于土耳其,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他已经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科学杂志》等顶级经济学期刊发表了 100 多篇论文,并于 2005 年获得了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他的研究领域极为广阔,涉及政治经济学、经济增长、劳动经济学等各个领域。罗宾斯是阿西莫格鲁多年的合作作者,他们两个和另一个合作者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共同发表了近 30 多篇论文,对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有很大的影响。罗宾斯和阿西莫格鲁还曾一起出版了《独裁与民主的经济起源》一书。

《国家为什么失败》2012 年出版之后,引起极大轰动,一直畅销不衰。此书最先由我介绍给湖南科技出版社,我还介绍了我的师弟李增刚博士担纲翻译重任。从开始翻译,到中译本的最终出版,时隔两年,中间颇多波折,诚可谓好事多磨。

阅读此书,读者不由得会被作者汪洋恣肆的文笔倾倒。两位作者穿越时空,时而把我们带到古罗马帝国,时而把我们引入网络时代,时而谈到古代玛雅文明,时而又会游历中东的穆斯林世界。这种史论兼顾、娓娓道来的风格,在经济学著作里已是久违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斯将经济学重新带回了广阔的现实世界,带回了政治经济学的传统。

此书是一本经济学理论著作,而非一本历史书。作者试图回答的问题是,经济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即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兴盛,有的国家却长期落后。这一问题是经济增长理论的终极关怀,是萦绕发展经济学的主旋律,也是推动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不断探究的动力。这一问题不仅令经济学家痴迷,也吸引了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关注。

若是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增长的源泉无非是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

诺贝尔奖得主诺斯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出,制度是最重要的,制度的最重要使命是保护产权。良好的产权制度安排能够提供适宜的激励机制,鼓励人们去创新,而个人的努力最终将带来社会财富的积累。诺斯的理论在中国一度风靡一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中国人很容易理解制度变迁带来的巨大差异。

高。按照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穷国应该逐渐赶上富国,最终会出现“趋同”。遗憾的是,这样的好事很少发生。穷国摆脱落后局面,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比一国内部的贫富差距还大,而且这一趋势并没有出现逆转。发展经济学沿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试图改变落后国家的悲惨命运。发展经济学家尝试了“大推进”,也试验了“平衡增长”;有的鼓吹“进口替代”,有的主张“出口导向”;一开始推崇资本投资,后来则强调人力资本投资,但这么多年下来,他们不得不承认:成功的案例寥寥。

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忽视了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国家的行为动机并非像经济学模型中假设的那样,总是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国家有其自己的动机,经济增长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因为只有国家才能提供较为充分的产权保护,但国家又时常是扼杀经济增长的主要元凶,因为政府会犯错、官员会寻租、民主易于畸变为民粹。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释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

诺贝尔奖得主诺斯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出,制度是最重要的,制度的最重要使命是保护产权。良好的产权制度安排能够提供